



多地清退共享电动自行车

引争议

公益律师提起合法性审查申请 省司法厅要求相关单位研究修改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梓青 李妹妍

“清退共享电动自行车，我们认为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今年下半年以来，广东省多个地市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清退行动引起了公益律师廖建勋的注意。

深入研究了相关政策文件后，廖建勋在10月下旬针对《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公安厅转发市场监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向广东省司法厅提起了合法性审查的申请。

实际上，自2017年交通运输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及“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以来，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始终面临着“身份未明”的尴尬。对共享电动自行车而言，质疑从未间断，但认可似乎也一直相伴。

就在羊城晚报记者发稿前，廖建勋收到了广东省司法厅的复函：“经研究，我厅认为……‘落实国家不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政策、督促共享单车企业限期清理回收共享电动自行车’条款，与国家有关文件表述不尽一致，并已提出审查意见要求相关单位进行研究修改。”



佛山市禅城区骑乘共享电动车的市民 羊城晚报记者 孙梓青 摄

风暴来袭：限期全面清退共享电动自行车

早晨5:10起床，骑共享电动自行车半个小时，再坐上06:20开往广州的大巴——对生活在中山、工作在广州的R先生而言，这样的通勤方式虽然需要早起，但“既能兼顾家庭和生活，辛苦也是值得的”。

家住佛山新城的M女士同样认为共享电动自行车方便了出行。她告诉记者，自己搭乘地铁上班，到地铁普君北站或同济站出来，骑共享电单车，十来分钟就能到单位。“从地铁站到公司，步行要半个小时，坐公交车有三站，等公交的时间我骑车都可以到了。”

不过，这样的通勤方式很快将行不通了——佛山、中山、东莞、江门等多个城市从今年6月开始纷纷出台通知，要求对共享

电单车进行全面清理整治。

6月11日，佛山市政府召开“交通秩序提升百日行动”工作部署会。有消息称，根据会议部署，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将组织各区约谈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法人，并督促限期清理已投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

羊城晚报记者获得的一份编号为佛交[2020]297号文件显示，“根据全市不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精神，全市统一开展存量共享电单车清理工作”。按照该文件要求，各区应“督促运营企业11月30日前自行清理回收车辆……对企业逾期拒不回收的，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开展清理并集中停放于指定场地。至12月31日，路面共享电动自行车数量较十月初应至少减少

80%。”

6月12日，中山市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要求对共享电动自行车进行全面清理整治，督促运营企业限期清理回收存量共享电动自行车，未经批准不得继续投放。

8月29日，江门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关于限期回收存量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通知》，要求运营企业于9月2日前主动回收目前已投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并不再继续投放。

据媒体公开报道，截至7月31日，佛山市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清收共享自行车、共享助力车40763台，减量超过34%；截至8月12日，中山全市清理共享电单车9.1万辆，约占总投放量的87.8%。

出行优选：佛山使用量峰值近90万车次/日

然而，羊城晚报记者在佛山市禅城区走访发现，街道上共享电动自行车数量仍不在少数。

在祖庙附近的一个路口，记者注意到在短短十分钟内有26辆共享电动自行车经过。市民陈小小姐告诉记者：“几公里的距离，打车太奢侈，骑自行车又太累，一般都会选择电动自行车。”

事实上，随着城市道路拥

堵、公共交通不足等出行问题的日益突出，针对中短途出行痛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应运而生。

据相关统计，截至今年9月，佛山全市共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约10万辆。以8月为例，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使用量超过75万车次/日，峰值使用量接近90万车次/日。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发布的《全国共享电单车行业发展报告》显示：目前

全国已投放共享电单车总量近500万辆，据估算，这些共享电单车服务覆盖了近5亿城镇人口，约占全国城镇人口的一半多。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慢行交通分会秘书长屈晔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是一个有市场需求、符合环保理念、有助于缓解城市通行压力的新行业，“应该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的科技手段去管控它，而不是禁止它。”

律师质疑：清退电动自行车缺乏法律依据

那么，上述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有关政策要求”是怎么规定的呢？

羊城晚报记者翻阅资料发现，最早对共享电动自行车发展作出相关规定的，是2017年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家十部门意见”）。在这份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不鼓励发展不等于禁止发展。”廖建勋向羊城晚报记者分析到，国家十部门意见明确提到“经国务院同意”，这相当于国务院的决定，可以作为行政的依据。“从字面理解，不鼓励发展只是在产业政策方面不予以倾斜，并不代

表不能够发展。”

至于国家三部门意见，廖建勋认为，这仅仅属于规范性文件，并不能作为政府行政的法律依据。“因此，国家三部门通知依据国家三部门意见提出的‘督促共享电单车企业限期清理回收共享电动自行车’要求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一定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廖建勋看来，对共享电动自行车进行清退是对企业、个人财产的重大限制措施，必须由法律和法规进行规定。

依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的规定，廖建勋向广东省司法厅提出申请，要求对广东省三部门通知进行合法性审查。

如何破局：前瞻性规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屈晔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前景充满信心。

在她看来，2019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编入发展绿色产业目录，明确鼓励发展共享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营、发展共享交通业务“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在共享自行车刚刚兴起之时，部分运营企业违规投放、超标投放车辆，上演的“彩虹大战”曾加剧了城市管理的压力。然而，这样的问题现在并非无解。

“目前我们已经能够很好地解决总量管控的问题。”她告诉

记者，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开发的共享电动自行车管理平台“可以获取车辆的实时运行数据，从使用率、闲置率等多方面掌握车辆的运营状况和车企的运维状况，实现城市总量的动态管控和车企配额的科学管理。”

此外，不少城市正创新管理机制，力求破解管理难题：如江苏南通采用“特许经营”的管理模式，云南昆明采用“规范运行”的管理模式，浙江则推行“立法引领”的管理模式。

屈晔笑称，经过共享自行车的发展，很多城市在开放共享电动自行车进入运营之前，相关管

理部门会提前介入，有前瞻性地规范和引导行业发展。

但国家层面对此仍未有明确的发展定位。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公开建议，有关部门应引导支持共享电单车行业发展，同时加强共享电单车骑行安全管理。在他看来，国家层面仍未给予共享电动自行车明确定位，因此各地政府对政策方向仍持观望态度，“这种情况制约了共享电单车的健康发展，也给相关企业带来了经营成本压力和投资风险。”

全国先进工作者戴维列：

重案零失误 32年破译超万件无声物证

文/李焕坤 梁栩豪 图/受访者提供

记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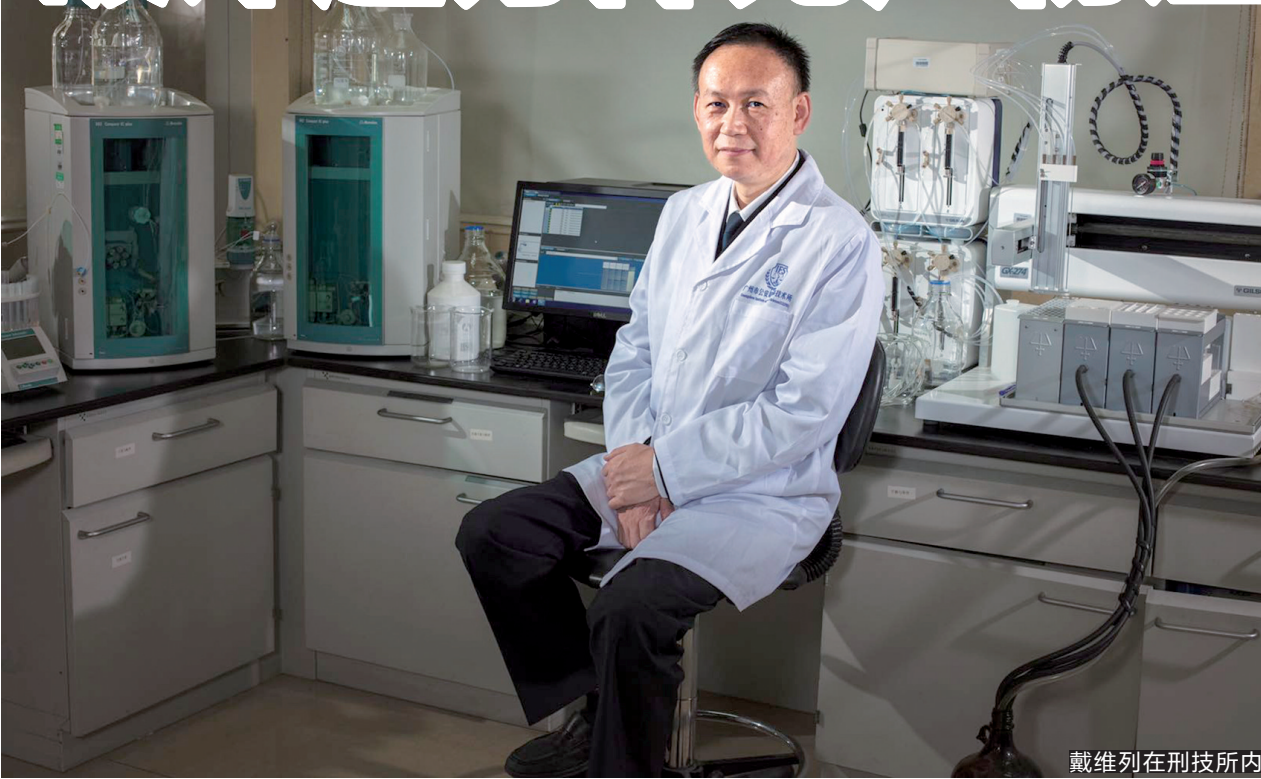
两获殊荣 依然不骄不躁

“老戴，找你！”“诶！”语音刚落，穿着深蓝色线衫、黑夹克、黑裤子的戴维列从房间走出。看到记者，他爽朗一挥手，大步跨向茶水间。“就这吧，有什么想问的你快和我说说。”干脆、果断，这是戴维列给记者的初印象。

然而，采访并不如戴维列所愿，能“快快结束”。期间，他满是排裂痕迹的手机屏幕不断亮起，有时是电话，有时是微信。“不好意思啊，这个必须紧急处理。”他一边回复那头，一边礼貌地向记者表示歉意。敬业，这是戴维列给记者的第二印象。

今年55岁的戴维列，已经是第二次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上一次已经是15年前。对此，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和公安系统绝大多数人一样，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他就不会觉得这是负担，付出时也不会考虑太多。”

戴维列表示，现在技术发展非常快，新型犯罪不断出现，自己还要不断学习，不做“新时代的文盲”，要利用科技手段打击新型犯罪。不骄不躁，这是戴维列给记者的第三印象。



戴维列在刑技所内

参与2000多宗重大刑事案件的过万件物证及毒物检验工作，零失误、零差错；参加并指挥上百宗重特大案件现场勘验，带领全市专业化现场勘查率从2016年初的15.3%提升到2019年的100%；带领刑事技术所获得5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入选全国首批DNA打拐实验室……这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广州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所（下称“刑技所”）所长戴维列的一小部分事迹。

32年刑侦生涯，戴维列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往返于整洁安静的实验室和形形色色的案发现场，用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破译一件件不会说话的物证，推动科研创新，为刑事技术插上腾飞的翅膀。“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这是我们永远的使命！”他一脸坚毅。

致敬劳动者
奋进新时代



24小时待命，疫情依然奋战一线

“丁零零……”2020年1月底，一个电话把处于待命状态的戴维列叫到了案发现场。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一桩涉及两名长者死亡案件，成了刑技所接到的第一宗涉疫情案件。

早在疫情爆发初期，刑技所已经按照要求采购防护设备，做好人员培训。作为支部书记的戴维列充分发挥党员、专家先锋模范作用，组建了以警务专家、党员骨干为主的疫情防控应急处置突击队。接到两名长者死亡案件后，突击队搜集资料发现，两名死亡长者生前曾雇佣过一名来自涉疫重点地区的保姆，这立刻给团队敲响警钟。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保姆在大年三十前后从涉疫重点地区回来，有发烧症状。因此，两位长者要求她每日量体温，与她发生了矛盾。两长者死后，保

姆不知所踪。”戴维列介绍，根据这一线索，警方马上对保姆进行抓捕，发现其体温超过38摄氏度，立刻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处置，并进行了核酸检测。所有参与现场勘查的人员和其他办案人员一直在空地上等候保姆的核酸检测结果，直到第二天得知其结果呈阴性，才离开空地，做自我隔离。

虽然已经走上领导岗位，戴维列依然奋战在刑事技术一线，这次面对新冠疫情也不例外。他表示，虽然防护措施做得足，但每一次现场勘查，与死者打交道依然充满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没有一个行业敢说自己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我们在工作，无法从不会说话的死者那里了解他/她是否来自涉疫地区、是否患有新冠肺炎。但公安工作不能停，防护要做好，疫情要控制，案件更要破！”戴维列坚定地说。

推动技术创新，靠微生物破命案

全省刑事技术三大会战中总分排名全省第一；科研成果获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31项；获得专利26项……近年来，刑技所以案件需求为引导，以技术创新为第一动力，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确保广州刑事技术始终走在前列。戴维列认为，刑事技术在案件侦查中起到了技术引领的作用，技术创新一方面能更好地为侦查提供线索，另一方面能更好地为法庭提供证据。“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证据，我们该做的，就是把掌握的信息转化成证据。”

戴维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广州水域广阔，水中腐败尸体的死因鉴定曾是广州乃至全世界法医面临的难题。戴维列指出，死因鉴定的关键点，在于判断出死者是生前落水还是死后落

水。奔着这个关键点，刑技所课题组系统研究了10多年，终于在硅藻的富集方法、消解提取、定性定量等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大量研究分析发现，生前落水的死者体内器官大多可检测到硅藻，死后落水基本检测不出。”

据统计，这项研究成果先后协助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检案400余宗，解决了一批具有较强社会影响的案件。2017年，《法医硅藻检验关键技术与设备研发》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9年12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荣获全国公安机关首届刑事技术“双十计划”攻关创新大赛金奖；公安部刑侦侦查局举办了5期全国硅藻检验高级培训班，在全国公安机关推广硅藻检验的新技术。

精益求精分析，尽量保护当事人

1988年，23岁的戴维列还是名意气风发的青年。从中山大学化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直接进入广州市公安系统工作，这一干就是32年。学校和单位的差异带给他很多思考：“在学校遇到的是专业性问题，而公安系统需要你透过专业性问题去分析成因和走向，需要人为判断。”

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对当事人的伤害，戴维列一直秉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前段时间，一男子在饭店喝完酒后次日中毒身亡，同行者被送往医院抢救。刑技所检验，饭店的酒和遗体内均有甲醇成分。“我们需要判断，甲醇是来源于制酒过程中的工业酒精，还是人为添加。前者涉及范围广、影响人群大，后者

则是个案。”

为了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戴维列带领团队仔细分析化验，发现遗体内的甲醇含量很高，这种情况很少在涉工业酒精案件内出现，判断很可能是后期添加。根据这个判断，团队到饭店勘查，发现了某种燃料：“这种燃料以甲醇为主，气味和酒味非常接近。我们猜想，有人把该燃料当成了酒使用。”

根据这条线索，办案人员对燃料的销售、使用等情况展开调查，最后确定案情和猜想一致。戴维列表示，如果没有掌握正确线索、作出正确判断，案件就难以在短时间内被侦破。“这不仅影响死者家属，还可能因为错误判断，引发社会性恐慌，必须精益求精。”